

们有理由认定顾颉刚关于美国的基本认识正是来自于孙中山。顾颉刚在其文章中亦曾坦承这一点：

“旧日的学者往往把血统相同作为构成民族的条件……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美国人的种族比那一国都要复杂，各洲各国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国之后就溶化起来，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自成为一种民族。这种民族既不是原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又不是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欧洲人，另外是一种新民族，可以叫作美利坚民族。美国固有独立的民族，所以变成了世界上独立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血统的分歧并不能阻碍民族的统一，美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sup>1</sup>

## 孙中山与美国：幻想破灭及其对国族主义的影响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三）

熊芳亮

美国政府对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冷漠、傲慢与决绝，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支持、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幻想，同时在其“三民主义”学说，包括“国族主义”构建中降低甚至消减美国政制和美国模式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不仅知道“国族主义”是分辨孙中山“旧的民族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分水岭，而且知道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构建：即主要倡导“政治化”、“美国化”的早期构建阶段，和主要倡导“文化化”、“传统化”的后期构建阶段。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构建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理论异变？这种“异变”导致了怎样的理论影响和政治后果？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人民共和创立新中国，而不是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国族主义”？

**从孙中山树立革命思想、创立革命团体、形成革命理论、领导革命运动之初，孙中山就一直幻想能获得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理解、支持，以帮助其完成革命的使命、达成革命的目标。美国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政治生涯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首先，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直接渊源于西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主张“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sup>2</sup>。早在“三民主义”创立之前，孙中山就曾在美国发表演说，宣称要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sup>3</sup>，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sup>4</sup>。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曾多次向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为先进文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sup>5</sup>。

其次，从革命力量上来看，美国华人华侨是革命运动重要的支持力量和经费来源。孙中山的

Sinkiang-China's Link with the Middle East," Pacific Affairs 15, 4 (December 1942), pp. 457-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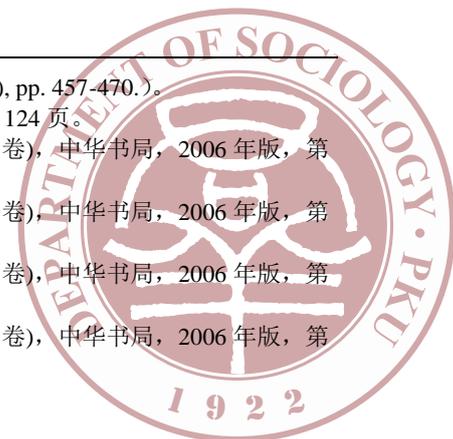
<sup>1</sup> 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页。

<sup>2</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2页。

<sup>3</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3页。

<sup>4</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6页。

<sup>5</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0页。



革命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资助和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可谓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多次往返海外，其中包括美国，在华人华侨中广泛宣扬革命、募集善款、策划革命运动。

第三，从外交关系来看，孙中山一直幻想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能够支持其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提出希望美国政府和人民能够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给以同情和支援”，并希望能在美国人中间找到许多的辣菲德<sup>1</sup>。1908年，孙中山甚至与美国人制定过一份秘密的“长堤（Long Beach）计划”，试图通过设立“中国革命公司”的形式向美国资本家筹措巨款，以美国为根据地开展革命运动<sup>2</sup>。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曾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美国在拯救欧洲之后“转以拯救中国”<sup>3</sup>。

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政治现实还是外交关系出发，孙中山都极度依赖，或者幻想可以依赖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对其给予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和革命组织中处处宣扬“以美国为榜样”，将“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在与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人士接触时处处宣称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sup>4</sup>，背后显然具有开展“价值观外交”，争取美国支持、承认和援助的目的和动机。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统战理论”。

**但是，孙中山热切企盼、一厢情愿的“热脸”，遇到的是美国政府决绝无情、趾高气扬的“冷屁股”。**

第一，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无论是最初的辛亥革命，还是其后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都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论是对清政府，还是随后的北洋政府，美国的在华政策基本上一直秉承“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基本原则。维护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实际上的统一）是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实际上已经扮演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际上成为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孙中山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显然都有损于美国利益，美国政府把孙中山视为“鼓励推翻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的领袖”<sup>5</sup>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并不是可靠的政治伙伴或政治盟友。美国政府怀疑孙中山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会损害美国利益，有损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实施和实现。1918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危险的机会主义者，他出于绝望和天真可能把中国出卖给日本”<sup>6</sup>。1921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 Crane）曾称，孙中山“与日本及安福系私通”，在“为个人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是“不慎重的冒险家”<sup>7</sup>。

<sup>1</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5页。

<sup>2</sup> 张忠正：《孙中山与美国人合作的中国革命计划（1908—1911）》，《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卷），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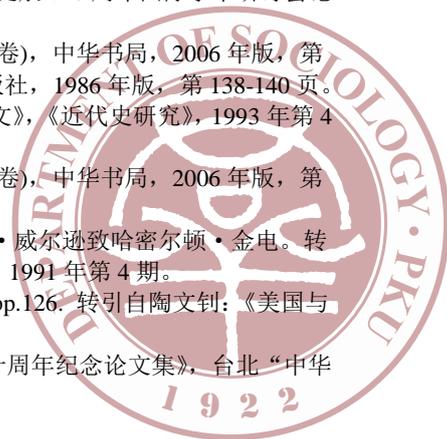
<sup>3</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2-514页。英文原电见《威尔逊书信文件集》（第53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40页。中英文版本稍有殊异。参见高鸿志：《读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电〉的中译文》，《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sup>4</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0页。

<sup>5</sup> 美国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档案，第16971号，RG84，1909年3月11日亨廷顿·威尔逊致哈密尔顿·金电。转引自吴乾兑：《1908年孙中山在曼谷——与美国驻暹罗公使的会见》，《史林》，1991年第4期。

<sup>6</sup> Noel H. Pugach: *Paul S. Reinsch. 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 New York, 1979, pp.126. 转引自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sup>7</sup> 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中华民国史料中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华



第三，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的政治品性值得怀疑。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方便，孙中山曾伪造其在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冒充”美国公民。1908年11月，孙中山自新加坡到暹罗（泰国）宣传革命，遭到曼谷市政府的驱逐，曾试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请求美国帮助，并与美国驻暹罗公使哈密尔顿·金进行会谈，但美国政府以孙中山“不但没有履行美国公民的责任，而且所从事的完全是中国的政治活动”为由，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sup>1</sup>。1922年，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声称孙中山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不可能称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sup>2</sup>。

正如美国学者所研究的那样，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低估和误解，造成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的傲慢态度<sup>3</sup>。在上述立场和认知的前提之下，美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承认、支持或援助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如此，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美国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挠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孙中山决定与苏俄结盟之前，美国政府至少四次予以孙中山以沉重的政治打击，终于让孙中山心灰意冷，彻底断绝了得到美国承认、支持、援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一次，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欧美国家纷纷支持北洋政府，镇压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运动”。1916年袁氏帝制失败之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派系纷争，政治上竞篡中央，军事上穷兵黩武，外交上卖国求荣，经济上强取豪夺，文化上尊孔复古，府院相争、张勋复辟、孔子入宪、曹锟贿选、直奉战争，一幕幕丑剧、闹剧相继上演。1917年，孙中山在部分国会议员和南方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但是，欧美国家，包括美国不仅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广州政府，反而更为积极、急切地支持、援助北洋政府。1918年11月，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说服美国放弃支持北方政府的立场，称“美国以道义物质之力为北方武人假借以压折人民，则中国民权发达之望，生机必绝，唯搔首问天而已”<sup>4</sup>，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美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电报根本就没有送呈威尔逊。

第二次，美国政府漠视孙中山关于广州军政府派遣代表参加太平洋会议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瓜分战败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遗产，以及平衡西方列强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势力，美国政府组织召开了太平洋会议。孙中山曾希望广州政府也派代表参加。1921年9月，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院，称“南方合法政府，为代表中华民国之全国政府，故派遣太平洋会议代表，应由合法正式政府派出”；宣称“北方政府为非法政府”，“如由非法政府派遣代表，所议决条件，在中华民国绝对不可能发生效力”<sup>5</sup>。但是孙中山的提议再次遭到美国政府的漠视和否决。

第三次，在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命悬一线几乎走投无路之时，美国政府不仅见死不救还对孙中山落井下石。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的政治盟友、广东军阀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公然叛变革命。孙中山死里逃生，登上永丰舰避难。在此期间，孙中山曾通过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

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246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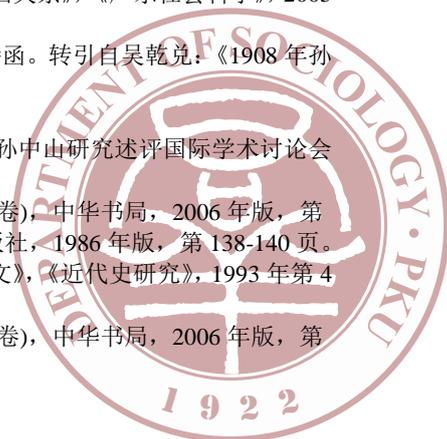
<sup>1</sup> 美国国家档案局，国务院档案，第16971号，RG84,1908年哈密尔顿·金致卢特函。转引自吴乾兑：《1908年孙中山在曼谷——与美国驻暹罗公使的会见》，《史林》，1991年第4期。

<sup>2</sup> 转引自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sup>3</sup> [美]史扶邻(Harold I. Schiffrin)：《近五十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曾学白译，《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3月。

<sup>4</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2-514页。英文原电见《威尔逊书信文件集》（第53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40页。中英文版本稍有殊异。参见高鸿志：《读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电〉的中译文》，《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sup>5</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6页。



斯顿，转达其“有尊严”的“下野”，以及“希望领事团斡旋”的愿望。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接到休斯敦的报告后断然予以拒绝，要求“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不仅如此，舒尔曼还致电美国国务院，称“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sup>1</sup>。

第四次，美国政府带头抵制、破坏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努力。在民国初期，中国海关的关税盈余继续由西方列强把持。在开展“护法运动”、成立广州军政府之后，孙中山一直希望西方列强能够将广州的关税盈余转交给广州政府而不是北洋政府。但是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漠视和拒绝，欧美国家的甚至不惜派遣军舰进入广州港对孙中山进行武力恫吓，更令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同来之战舰”竟然还“较多于别国”<sup>2</sup>。1924年12月，孙中山在其致美国国民书中，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制者乎？”<sup>3</sup>

残酷的政治现实，终于迫使孙中山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下来，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祸乱之源**不仅“在军阀”还在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sup>4</sup>；“如果没有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的支援，北京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有外国这个后台，人民将不费吹灰之力来推翻整个的军阀制度”<sup>5</sup>。不仅如此，孙中山更明确指出：“对于我们现时的大混乱和大崩溃，美国必须特别地承担责任”<sup>6</sup>。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孙中山的“国族主义”，会经历前后两个构建阶段，且不同的阶段对于“美国经验”或“美国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如何构建“国族”也有着完全迥异的理论设想。也就是说：对美国幻想的破灭，是孙中山在“国族主义”后期构建阶段中刻意回避，甚至有意消减“美国模式”对其“国族主义”影响的重要原因。

## “戴季陶主义”的崛起与顾颉刚的宿命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四）

熊芳亮

面对以伪造、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起家的蒋介石集团，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不可能影响、更遑论改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治的既定轨迹。“国族-宗族”论的出炉，实际上标志着孙中山所设想的两种“国族”构建模式：无论是“美国化、政治化”的“国族”构建，还是“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构建，都伴随蒋介石集团的腐朽专制统治，一起沦亡。

<sup>1</sup>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Schurman, FRUS, 1922, vol.I, pp.725。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22-123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sup>2</sup>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28-129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sup>3</sup>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28-129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sup>4</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8页。

<sup>5</sup>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sup>6</sup>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